

人類學觀點下的西拉雅族群圖像：再評邵式柏著 《十七世紀西拉雅人的婚姻與強制性墮胎》

李瑞源（Paparil Tavali）*

作者：John Robert Shepherd（邵式柏）

書名：*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出版：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出版年份：1995

頁數：99 頁

John Robert Shepherd（邵式柏），美國人類學家，任教於維吉尼亞大學人類學系。早期大部分研究都和臺灣歷史文化相關，特別是平埔族群議題，近年來則從事 20 世紀前後臺灣的人口學研究，包括性別、婚姻、死亡率等，希望能解析漢人社會在婚姻模式上的特徵。¹從 1980 年代以後陸續發表期刊論文，其中包括 1981 年畢業於史丹福大學的博士論文〈17 及 18 世紀臺灣拓墾中的漢番關係〉，並於 1993 年改寫成《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出版，²成為臺灣史研究者經常引用的經典書籍。邵式柏同時也是少數熟悉臺灣西南部西拉雅族的外國學者，1986 年曾發表〈漢化的西拉雅人對阿立祖的崇拜〉，³比對文獻記載和當代祭典的異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
投稿日期：101.11.19；接受刊登日期：101.12.10；最後修訂日期：101.12.24

¹ 關於邵式柏的詳細研究著作介紹，請參考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人類學系網站，
<http://anthropology.virginia.edu/faculty/profile/jrs4c>

² Shepherd, John R.,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³ Shepherd, John R., "Sinicized Siraya Worship of A-Li-Tsu,"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8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頁 1-81。

李瑞源／人類學觀點下的西拉雅族群圖像：

再評邵式柏著《十七世紀西拉雅人的婚姻與強制性墮胎》

同，釐清西拉雅祭典當中文化混合的要素。他對西拉雅族的阿立祖信仰有個人獨特的解釋，足跡遍查臺南吉貝耍、頭社、北頭洋、左鎮等地公廨廟宇，奠定日後出版另一本文化人類學專書的基礎，即 1995 年發行的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十七世紀西拉雅人的婚姻與強制性墮胎），⁴即本篇書評所要評介的對象。之後，2003 年再次針對近代西拉雅族家庭、婚姻本身做了一次文獻考察，發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拉雅族婚姻習俗：戶籍資料的初步探討〉，⁵對西拉雅族的歷史研究著力甚深。以下先忠實介紹專書各章內容，再列舉尚可討論的議題以供參酌。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本書共分八章，另收二篇附錄。全書以二個令人極度訝異的行為本身—婦女強制性墮胎、婦女延遲生育（35~38 歲）為中心，探討此行為背後隱含的文化脈絡為何？從中試圖重建西拉雅族的族群社會圖像。因此，在第一章序論中，先指出 17 世紀一位荷蘭牧師甘治士（Candidius）於 1628 年 12 月所記載的西拉雅風俗，也就是婦女未到 35~38 歲不得生育，在此年歲之前的懷孕都必須藉由西拉雅女祭司（Inibs）以按摩推壓方式使其流產，也就是強制性墮胎，並且婦女普遍都有墮胎經驗，有的甚至達到 16~17 次之多。這篇報導引起 17、18 世紀歐洲人對此奇風異俗的討論，特別是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馬爾薩斯（Malthus, 1766-1834）所稟持的二種分析觀點，這部分將於第二章專文探討。作者在序論的後半段，也針對以傳統人工方式進行強制性墮胎的安全性做了相關文獻研究，希望讀者，包括他自己本身，能夠先摒除傳統按摩推壓式的墮胎是極度危險的「先入為主」觀念，並引用近期學者對泰國、菲律賓的傳統按摩推壓式墮胎研究，表明這種原始方式其實並不如想像中危險。

⁴ Shepherd, John R.,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Arlington, (VA: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 .

⁵ Shepherd, John R., "Siraya Marriage Practices in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Preliminary Explorations in the Household Registers,"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大型研討會論文集」，2003 年 9 月 30 日-10 月 2 日，頁 239-286。

第二章旨在介紹歐洲觀點下的解釋。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的一篇文章〈立法者與物種繁殖之間的關係〉，比較漢人社會和西拉雅人之間的異同。他認為「良好的氣候條件」是促使人口自然繁衍的主要因素，然而卻面臨人口過度繁殖的危險，因此需要採取適當手段來控制人口增長。在漢人社會採取溺嬰方式，如同西拉雅人採強制墮胎，都是有效控制人口壓力的手段。其中，孟德斯鳩特別關注西拉雅執法者女祭司（Inibs）的角色，以及宗教信仰迫使人們順從的相互關係。同樣是人口過度繁殖的前提下，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的一篇文章〈論南海島嶼中的人口控制〉，則從「原始共產社會」角度來看待，此種社會型態讓個別父母免除考慮總體經濟資源的約束，持續生育的結果造成社群膨脹。當原始共產社會承擔整體性人口壓力之際，必會擬定一套壓抑人口成長的文化制度，進而產生強制性墮胎機制；另外，這套文化制度又相繫於婚姻的二段式安排（分居、同居），作為預防性的控制手段。整體而言，強制性墮胎無疑是原始共產社會因著人口危機意識而內生的社會控制一環。

第三章作者針對人口學觀點，反駁上述二者見解，另闢一套合理解釋。邵式柏引用荷蘭文獻的相關記載，論證西拉雅人並未產生食物匱乏或人口壓力問題，西拉雅人居住於腹地遼闊且地力肥沃地帶，鹿群飛躍其中成為肉類蛋白質來源，食物和營養源源充足，身材高昂茁壯，這些證詞反而顯示出低度人口密度的事實（5.2 人/平方公里），自然無需強制墮胎來節制人口。更何況，考量村際戰爭頻繁，時有獵人頭死傷等情勢，為護衛村社安全應更加鼓勵生育來增強戰力才是。另外對於高齡生育的討論，作者援引 20 世紀擁有同樣習俗的社會——哈特派信徒（the Hutterites）、愛爾蘭人（the Irish）為例，說明西拉雅人並非特例，但應該考慮平均壽命的問題，以及物產資源豐富其實會導致「低度生產力」的人類學觀點。因此，預先縮短生育年限的高齡生產，充其量能夠維持一個穩定的人口數。最後則談論到 Divale、Harris 相關人口學命題的文化唯物論（cultural materialism），邵式柏認為這種理論模型犯了理論先行的缺點，使其完全背離西拉雅社會風俗，難以探究問題核心。既然人口

李瑞源／人類學觀點下的西拉雅族群圖像：

再評邵式柏著《十七世紀西拉雅人的婚姻與強制性墮胎》

學觀點無法釐清人口壓力和強制墮胎之間的疑惑，作者便傾向從婚姻和家庭制度的設計，去思考為何西拉雅人會對人口成長不感興趣，寧願承受強制性墮胎的必要過程。

第四章在探討西拉雅人的家庭結構與社會組織。作者從婚姻的締結開始觀察，進而發現婚後私通的現象普遍存在，他認為這是西拉雅人刻意設立一個薄弱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結果，因此離婚的案例屢見不鮮。邵式柏結合「男性年齡層組織」和「婦女強制性墮胎」在生命時程上的同步性，做出妻子結束墮胎的時機並非隨著年紀而定，而是丈夫完成男性年齡層職責，離開原居村社，來到妻家聚落田地「正式」組織婚後家庭的時刻。作者鉅細靡遺地從紛沓無緒的線索中找出關鍵性答案，確是值得喝采的莫大貢獻。

邵式柏進一步從「男性年齡層組織」和「男性性別結構」作為考察對象，認為西拉雅男性對部落安全富有相當大的責任，使其從小就浸漬在尚武色彩之中。男性自幼年 4 歲起均需離開父母，加入不同等級的年齡層級接受訓練，並住在男子會所；17 歲視為成年，能夠任意蓄髮、追求情人；20~21 歲可以結婚。但婚後並不是和妻子住在一起，而是待在生家庭居住，直到 40~42 歲完成男性年齡層級任務後，才能「從妻居」，此時妻子才准懷孕生育。作者認為「婚後分居—從妻居」設計，不僅是配合男性年齡層組織的運作，從男性性別觀點而言，更是降低丈夫和妻家男性（岳父、妻子兄弟）緊張關係的最好方式。當丈夫移居妻家之時，岳父已屆老邁、又較妻子兄弟年長，以致非處於從屬角色，而是積極扮演權力和責任的核心地位。

綜合婚姻與家庭形式的討論，邵式柏歸納出西拉雅婚姻的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夫妻分居，丈夫服務於男子年齡層級，妻子則強迫性墮胎；第二個階段，以妻家為中心同居，丈夫從男子年齡層級退休並移居妻家，夫妻開始撫育孩子。這種婚姻模式可稱之為「以妻家為中心的分居制」或「延後移入妻家制」婚姻。強制性墮胎，對西拉雅社會結構而言，解決了「男子年齡層級」和「以妻家為中心婚制」制

度面上的衝突，調和成「延後從妻居」模式，成為社會文化產物。然而，在同樣具備功能性的選項裡面，為何是極端的強制性墮胎，而不是其他相對方式(弑嬰、寄養、領養、獨身主義、杜絕婚前性行為)，這方面的選擇則有賴於宗教信仰上的解釋。

第五章在探討懷孕禁忌的象徵性分析。「懷孕禁忌」常見於原始部落社會，它是對於神秘生殖過程期間的種種禁忌之一。介於女性生產和男性獵頭行為之間，恰是賦予新生和索取生命的對立面，必須嚴格限制二者交會，成為原住民禁忌的普遍習俗，一般多採以迴避方式，或禁止觸碰農具、獵具等規範來區隔二者在性別象徵上的類同性。邵式柏認為，禁忌本身確切表達出專屬的性別活動領域，佈滿著危險和生命威脅，需要遵循性別上的嚴格規範並加以隔離，才能安然度過生命歷程危機，確保個人、家族或整體部落得以存續。然而，為何唯獨西拉雅人會採取延長男子年齡層級服務、強制性墮胎、延後從妻居等極端化方式，作者認為這應該是複雜的歷史過程，來自文化上的政治經濟學，將宗教信仰連結到社會結構，也將象徵邏輯鑲嵌到社會習俗，成為社會生活的具體實踐。

第六章在補充性別觀點。除了建構男性受年齡層級拘束和女性受強制性墮胎禁忌二者連結之外，作者有意從社會學觀點切入西拉雅女性之間的緊張關係，特別是從「利益觀點」來審視強制性墮胎對年輕女子和年長婦女之間，以及周旋於極富宗教象徵地位的女祭司（Inibs）之間的社會心理糾結。關鍵問題是，年輕已婚女子面對墮胎行為，究竟是處於主動或被迫的意願表達？她們可能樂於接受墮胎，因為可免除撫養孩子、保持身材、性吸引力、享受愛情或神聖的獻祭儀式；也可能被迫接受，緣於年長婦人或女祭司的忌妒心理（生育力、青春）、生產力勞動需求、極大化獻祭報酬，以及抗拒成年男人對於孩子的需求。邵式柏沒有明確答案，但卻指出「社會性別階層化」的可能現象，如同男性有世俗化的年齡層級在規範，女性或有類似組織在運作，特別彰顯於宗教層面，從最高指導人物女祭司，到年長婦人、年輕女性之間的等級秩序。整體而言，男、女性別組織兩者相互自主、補充又依賴，

李瑞源／人類學觀點下的西拉雅族群圖像：

再評邵式柏著《十七世紀西拉雅人的婚姻與強制性墮胎》

架構西拉雅社會在宗教和世俗權力階層的內在網絡。

第七章描述在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治理下廢除墮胎的文化變遷。1636年，西拉雅新港社有超過 50 對配偶以基督教儀式舉行婚禮，1639 年提升到 119 對，此時新港社 1047 人全部受洗。作者以數據顯示新港社在婚姻和信仰上的顯著改變，並著手探討改變歷程和影響層面。1636 年以前，荷蘭人和新港社人經常以聯軍方式對抗鄰近村社，透過荷蘭人的武力展示使新港社人輕易取得勝利與獵首首級，這結果不僅拉攏新港社人親近基督教育，更改變其政治環境和宗教世界觀。長期下來，進一步分裂村社內部基於傳統社會結構的權力基礎，也質疑男子年齡層級、婚後分居、墮胎、延後同居、延遲生養孩子的必要性。隨著 1636 年荷蘭人推展和平外交到其他 57 個村社，連帶將荷蘭文化、宗教信仰擴展出去。1641 年，在荷蘭人政治地位的穩固與自信下，驅逐 250 名西拉雅傳統權力核心的女祭司群。1643 年，西拉雅人有 5400 人受洗，超過 1000 對配偶舉行基督婚禮。墮胎習俗消失了，換來的是年輕配偶婚後同居、養育孩子、一同下田耕種的景象。

邵式柏認為，荷蘭人給予西拉雅人的，或者說西拉雅人所接受的，並不是新價值觀，而是一個獲取傳統上「成功」內涵的新途徑，展現在（1）軍事聯盟的勝利、（2）部落安全的保證、（3）提前達成的婚姻生活、（4）免受權力支配的青年階級。西拉雅社會內部的年齡層階級、墮胎禁忌、強制性墮胎形成一種從屬於權力的政治性結構情結，當它受到荷蘭政權挑戰時，西拉雅年輕人以行動證明他們寧願冒著違背傳統禁忌的危險，亟欲擺脫年長一輩的控制，並遵循荷蘭人的文化規則。這就是荷蘭人藉著軍事勝利和宗教力量所提供的內在動機，「成功」驅動西拉雅人異教改宗與實質服從。

第八章結論中，作者重申本專題論文的核心主題，即一個看似無法理解的強制性墮胎行為，如何聯繫於西拉雅社會文化的深層內涵。在以妻子家族為核心的婚姻制度裡，除非丈夫完成男子年齡層級的應盡義務，否則不允許夫妻同居或養育孩子。相對的，西拉雅社會也期望丈夫在服役完後，能夠在妻家居住並共同生養小孩。

為了調和二者，墮胎行為成了必要的文化制度實踐，也成全了丈夫處於原生家庭和妻家之間兩難的「忠誠度」考驗：一項以母系為核心制度的社會難題(matrilineal puzzle)。另一方面，邵式柏從宗教象徵意涵來解釋墮胎行為與其文化制度，由於神祕的懷孕禁忌情結，西拉雅社會將「獵首和分娩」視為對立禁忌，妻子懷孕將危及丈夫獵首行動的安全，必須嚴格控管墮胎執行。然而，緣於何種歷史情境--激烈村社戰爭、激進宗教需求、性戰爭或性別領域尖銳區隔，導致極端文化制度的產生，則是一項難以企及的歷史難題。

這本書迄今雖然相隔 17 年之久，但是它的價值與迴響絕不亞於當代西拉雅研究的學術貢獻，換言之，它仍是一座穩固基石，對於理解西拉雅社會組織、文化脈絡提供一條文化人類學觀點的蹊徑；更重要的是，作者清晰描繪西拉雅人的族群圖像，從安靜的歷史文獻中勾勒形象、精工彩繪並賦予生命力，使西拉雅人活生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這項優點也令筆者心生嚮往。然而，這本小書雖不乏學術界引用其資料與論點，但卻似乎隱沒茫茫書海之中，鮮少被提起、關注與評論，⁶而許多關心與研究西拉雅的文史工作者，也未能妥加善用書中所營構的西拉雅族群圖像，甚為可惜。

綜觀全書，以「強制性墮胎」作為核心命題，探究部分行為與整體社會之間如

⁶ 至今國內僅有一篇完整書評，作者陳景峰認為邵式柏以「結構性功能學派」論點詮釋西拉雅族社會文化，成為職能分工的類城邦組織。筆者對此則有不同見解，認為邵式柏稟持「文化人類學」對整體歷史文化的脈絡分析，建構西拉雅社會生活圖像，並不刻意強調結構功能說，何況他對於結構功能仍有負面批評。參見陳景峰，〈評介邵式柏著《十七世紀西拉雅族的婚姻與強制墮胎習俗》〉，《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8 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7），頁 263；John R. Shepherd,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p. 22。另外葉春榮曾於文章中提及此書並做論點介紹，給予極高評價，凌駕於作者備受好評的歷史研究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參見葉春榮，〈平埔族的人類學研究〉，收於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 121-125；國外書評部分，在本書出版不久，即有二篇書評上市，分別為阿姆斯特丹大學專研東南亞環境與經濟史的 Peter Boomgaard, "book reviews: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KITLV journals*, Vol. 152, No. 3 (1996), pp. 483-484；橫濱大學專研社會人類學的 Kasahara Masaharu（笠原政治），"reviewed work: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by John Robert Shepherd", *Asian Folklore Studies*, Vol. 55, No. 2 (1996), pp. 369-371。這兩篇文章多為介紹性質，較少評論。

李瑞源／人類學觀點下的西拉雅族群圖像：

再評邵式柏著《十七世紀西拉雅人的婚姻與強制性墮胎》

何交織結構，特別著重制度面向的重建與文化詮釋，回答強制性墮胎成為西拉雅社會產物的文化脈絡。本書優點，毋庸置疑，首先是深入淺出、言簡意賅的敘事風格，作者將旁枝末節的參註擱置文後，⁷讓主文論述明瞭俐落，加上循序漸進的章節鋪陳，有如深入原始叢林的冒險旅程，使閱讀者輕易陷於著迷境地，畢竟作者解答了一則過去長存已久的謎語，像解開神諭般的詩籤，令人讚嘆稱奇。其次，作者努力地讓我們知道荷蘭傳教士甘治士的一篇文章，如何引起啟蒙時代思想家們的看法與觀點，特別是具有代表性的蒙德斯鳩和馬爾薩斯，⁸不僅如此，連同 20 世紀以來的新論述，如文化唯物論的觀點也摻進來討論，⁹讓此一跨時代性的對話充滿機智言論，更可明瞭一個民族學行為本身如何牽連各家理論，自成一派學說。若理解至此，便裨益尋找新的論述空間加以研思，突破既有框架。再者，從學術觀點而言，邵式柏如何突破 18 世紀以降歐洲啟蒙思想家的主觀論述，推翻人口學觀點「人口壓力」所造成的強制性墮胎效應？作者除了呈現豐沛有餘的自然資源以反駁食物匱乏假設，並引用歷史文獻的統計數據與族群對照，證明西拉雅人在廣闊生活空間下的人口密度，其實是相當低的，¹⁰強化人口壓力不足採信，必須另謀解決之道——婚姻和家庭的制度分析——回歸正本清源的途徑。

儘管本書值得稱讚之處不勝枚舉，但仍存在一些尚待釋疑或釐清的學術課題，需要被加以關注和充分討論，以下列舉幾點以供參酌。

首先，西拉雅人的定義有待商榷：17 世紀當時尚未出現「西拉雅族」此一來自 20 世紀初期的學術性用語，就學界而言，西拉雅族的對象與範圍仍未有明確結論，一般而言代表臺南到屏東的平埔原住民，包含西拉雅四大社、大武壠四社熟番、

⁷ 這些參註其實是更深入的人類學觀點辯證，作者旁徵左引各家論述，不時有精彩交鋒，譬如對文化唯物論或功能學派（functionalism）的批評就是一例，參見第 3 章註 13，John R. Shepherd,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p. 22。但邵式柏擔心過多的論辯會干擾閱讀者思緒，便擱置文後另闢空間處理。

⁸ John R. Shepherd,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pp. 8-11.

⁹ Ibid., pp. 17-19.

¹⁰ Ibid., pp. 12-15.

馬卡道等三個系統。雖然許多學術著作都輕易地將目前耳熟能詳的西拉雅族應用在 17~19 世紀的研究課題上，但是先界定清楚研究對象本身，對著者、讀者而言還是相當必要性的基礎工作。

本書以西拉雅（Siraya）為名，就書名指涉對象而言，作者從 17 世紀荷蘭牧師甘治士所記載的史料本身出發（Candidius's Account），然而當時並無西拉雅這個稱呼，根據甘治士的說法，其記述對象乃限於附近從沿岸向山邊延伸的八個擁有相同風俗、習慣、宗教和語言的村社（新港、麻豆、蕭壠、目加溜灣、大目降、Tifulukan、Teopan、¹¹大武壠），這些村社若從熱蘭遮城出發都在一日路程之內，位置彼此相近，最遠的是大武壠社，來回一趟要花三天時間。¹²釐清這些村社和西拉雅(Siraya)之間的淵源關係，會更有助於理解族群定位、內涵與多元性，進一步對邵式柏的專題論文提出建設性評論。

首任荷蘭牧師甘治士在新港社蟄居 16 個月(1627.8~1628.12)完成這篇著名報導，所記述內容誠屬新港社的社會習俗無疑，但是否能擴大應用在其他七社則恐有疑慮，除非甘治士曾前往其他村社，並待上一段時間進行觀察和驗證，否則難以確認如此細緻入微的民族誌也適用於其他村社。¹³況且從他在新港社所進行的語言學習和宣教工作，已佔去大部分時間，而他還向巴達維亞總督庫恩（Coen）表達出，為了讓每個新港人都能接受新教育，已構想一整個星期的教導計畫。¹⁴若按照此初步規劃，則甘治士不僅將整天困在新港社，分身乏術，甚至連安息日都不間斷。甘治士想打造新港社成為模範村的願景與意圖非常明顯，可見其主要活動區域仍在新港社，至於其他七社風俗、習慣、宗教、語言是否完全和新港社一致，應多屬聽說

¹¹ 一般多將 Tifulukan 比照知母義社，Teopan 比照大嗶社，二者都位於臺南新化區內，在荷蘭人的整合之下，陸續併入大目降社，因此自 1647 年的地方會議，大目降社亦稱 Teopangh。參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 II》（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頁 607。

¹² Campbell, William M.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Kegan and Paul (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Co.,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 p. 9.

¹³ 甘治士在本篇民族誌中，曾提及他到過麻豆社的經驗，以及蕭壠社的一則傳聞，但不確定是聽他人轉述或親身到訪蕭壠社所得。參見 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14, 16.

¹⁴ Ibid., p. 96.

李瑞源／人類學觀點下的西拉雅族群圖像：

再評邵式柏著《十七世紀西拉雅人的婚姻與強制性墮胎》

而來的訊息，暫且保留。

作者邵式柏其實也注意到甘治士的民族誌，有其適用範圍的限制，因此特別舉出在後來文獻上的「親身實例」作為例證參考，諸如大武壠社的婚後家居模式為丈夫和妻子、孩子同居，或大木連社（Tapouliang）並未實行強制性墮胎等等。¹⁵類似的反證，我們能再以當代宗教文化來舉例，大武壠社群的公廨建築式樣，其實和新港、麻豆、蕭壠等社很不一樣，最明顯的區別之一在於將軍柱（向柱、祖先柱）、向神座的設置。至於語言部份，李壬癸的研究表明了麻豆社的語言結構不像西拉雅語，反倒偏向大武壠社群系統；¹⁶而南路下淡水一帶的語言，更迥異於新港語（或廣義西拉雅語）；¹⁷除語言之外，人類學家李國銘更從政治形態、聚落與房屋型態、婚姻制度全面議論族群分類上的盲點。¹⁸因此，本書用西拉雅一詞來概括遠比甘治士更大範圍的區域，有其不妥之處，這或許是本書成書於 1995 年，當時對於西拉雅族的認知仍以臺南至屏東的平埔原住民為主體，才會造成擴大解釋現象，有其時代性限制。¹⁹然而，在學術研究日益卓越的此刻，對於西拉雅的定義、用詞與內涵，恐怕需要進一步釐清與研究，倘若太快一味使用西拉雅，雖然悅耳動聽與極富想像力，卻只會更加模糊她的身分與文化多元性，失去的可能比得到的還要多。

第二，西拉雅人口密度有待重估：與上述問題相連結的，作者在比較臺灣平埔族群在人口學統計的數據分析時，援引張耀錡 1951 年〈平埔族社名對照表〉作為西拉雅族的具體對象，此對象包含道卡斯社群，但未包括大武壠社群，空間範圍

¹⁵ Ibid., p. 39. 邵式柏將鳳山八社納入西拉雅的討論範疇，自然也會探討南路一帶原住民村社的情況。大木連社（Tapouliang），即後來鳳山八社中的上淡水社，位於屏東萬丹鄉社皮一帶，參見李國銘，《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4），頁 23-24、53。

¹⁶ 李壬癸，〈臺南和高屏地區的平埔族語言：兼論麻豆社的地位〉，收入《建構西拉雅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臺南縣政府，2006），頁 8、12。

¹⁷ 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 303.

¹⁸ 李國銘，〈屏東平埔族群分類再議〉，《族群、歷史與祭儀》，頁 74-83。

¹⁹ 當時的一般認知，仍以李壬癸的族群分類為主流，將西拉雅族分為西拉雅亞族、大武壠亞族、馬卡道亞族，參見李壬癸，〈臺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臺灣風物》，第 42 卷，第 1 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1），頁 233、222-221、219。

為臺南縣麻豆鎮以南、屏東縣林邊鄉以北的廣大地區。²⁰但邵式柏另以 1650 年荷蘭人調查的番社戶口表為基礎資料，此資料納入大武壠社群，得出共有 21 個村社分散於臺南到屏東平原之間，即廣義的西拉雅族群。²¹

此族系定義不僅牽涉到村社數量的計算，還包含居住空間的面積與村社分布，進一步影響到平均村社密度、人口密度的數值，可謂關鍵性數據。文獻上的西拉雅村社寬敞錯落，呈現大型聚落規模，平均每社都有千人之譜，加上南路下淡水一帶稠密集聚的各狹長村社也有 800 人以上，使西拉雅人口密度相對較高（5.2 人/平方公里），僅次於噶瑪蘭社群（13.1 人/平方公里）。²²但若排除南路下淡水各村社，僅將空間限縮於大臺南市，則人口密度降低到 3.4 人/平方公里，²³此數據和其他平埔社群的人口空間分布相當接近，可呈現較為平實的區域性社群特色，儘管其結果都是相對低密度的環境負載力，並不影響其推論和結論，但從族群定義展延而來的思考與驗證過程，遠比數據和結論更為重要。²⁴

第三，「強制性」墮胎用詞宜再斟酌：邵式柏在書中，甚至在書名冠上「強制性墮胎」字眼（mandatory abortion）來形容新港人的社會習俗，容易令讀者以為作

²⁰ 張耀錡採用 1925 年小川尚義《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的分類方式，將西拉雅族(Siraya)分出四社熟番(Taivoan，即大武壠社群)，另立一族。參見張耀錡，〈平埔族社名對照表〉，《臺灣文獻專刊》，第 2 卷，第 1、2 期，另冊，頁 3-5、6-13，1951。此合刊本於日後增補改訂再刊，參見張耀錡編著，《臺灣平埔族社名研究》（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3），頁 25-30、32-39。

²¹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 31, 40-41, 415. 邵式柏並未交代所引區域面積的資料出處以及計算方式，故無從討論關於居住面積的認定。其似乎只計算大臺南市和下淡水一帶的居住面積，並未將二仁溪以南到高雄平原這一廣大而人煙稀少的區域算進去。

²²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 40-41.

²³ 臺南市面積 2191 平方公里，扣除洪雅族哆囉嘓社的白河區 126.4 平方公里，以該區總人次 6925 人（1650 年六社之番社戶口表）除之，得出人口密度 3.35 人/平方公里。數據參見臺南市政府網站 <http://www.tainan.gov.tw/taianan/Intro.asp?nsub=L1A000>、白河區公所網站 <http://web2.tainan.gov.tw/baihe/CP/10561/population.aspx>。

²⁴ 回到甘治士的民族誌本身，正本清源，邵式柏所聲稱的，或是當時相關資料所描述的對象，其實是新港人的社會文化本身，作者輕易地將新港人等同於西拉雅，接續著手西拉雅的墮胎平反運動，推翻人口壓力說的假設性論點。為了統計上的數據資料與便利性，進一步援用日治時期的「西拉雅」族群分類，擴大應用於「族群」範疇，使之成為人口學統計對象。如此一來，臺南、高雄、屏東一帶的「泛西拉雅」平埔族群，全都納入計算標準，其結果便可能錯估統計上的取樣數據，包括空間、環境，以及相聯繫的人文現象。於是，新港人的墮胎問題，便成為西拉雅族的歷史共業。

李瑞源／人類學觀點下的西拉雅族群圖像：

再評邵式柏著《十七世紀西拉雅人的婚姻與強制性墮胎》

者忠實反映原文詞意，然而重新翻查甘為霖的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所收錄甘治士對於該文化行為的用詞遣字後，卻產生不一致的筆觸感受，使筆者認為「強制性」墮胎一詞仍有待商榷。事實上，甘治士並未使用「強制性墮胎」來形容新港社婦女的墮胎習俗，反倒是含蓄委婉的「毀壞子宮內的果實」或「不被允許生孩子」，²⁵易言之，讓墮胎冠上「強制性」的，是作者邵式柏的本意。

「強制性」用詞在作者筆下可有二個文脈解釋。首先是指以人工方式進行外力干預的強制性流產，係客觀性描述，卻不無帶有後設立場的指涉；再者隱含女性之間或部落社會壓制式的權力關係(連結到第六章對於社會性別階層化的論點)，即暗示受孕婦女在非自願性下接受女祭司的推壓式墮胎，直接跳過婦女本身的意願表達。這二個「強制性」用法，似乎都還有討論空間。

針對第一點從客觀性角度來描述墮胎行為本身，確實是從外力強加其上的干預式做法，但是，除了墮胎之外，其他類似部落社會文化的身體毀飾儀式，特別是相關生命祭儀的紋面、拔齒、割禮、穿耳、剪髮，不也皆屬於外力干預的社會風俗，但我們很少聽到強制性紋面、強制性拔齒、強制性割禮、強制性穿耳、強制性剪髮等語彙，²⁶因為它內含于文化範疇；第二點，要如何認定在文化範疇內的行為者，是自願或非自願性接受社會情境下的規則，這是沒有意義的提問，即便從性別階層化論點切入也不甚妥當。或許婦女在此文化脈絡下並不覺得被「強迫」，從宗教信仰層面而言，接受墮胎的孕婦們，也可能因為意識到流產將帶給丈夫個人、部落整體的生命安全而感到釋懷，樂意為之，將之視為應然的善後措施，這也解釋為何部

²⁵ 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19-20. 甘為霖書中對於墮胎的相關文獻描述，也找不到具有強制性的用詞，一般多用「實行墮胎」，且具體而言主要是針對新港社居多，蕭壠社在政務員視察時出現一次，或籠統地說是北方村社，詳見 Ibid., pp. 19-20, 162, 163-164, 182-183, 288, 338, 371.

²⁶ 一般多將「穿耳」視為個人性裝飾行為，但也有些相關禁忌必須遵循，特別在新港人舉行 Karichang 祭典期間，父母親不能幫女兒穿耳洞，參見 J. Ogilby, ed., *Atlas Chinensis: Being a Second Part of a Relation of Remarkable Passages in Two Embassies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London, 1671), p. 36. 同樣的，剪髮或蓄髮的規定在新港社也格外明顯，從出生到成人都有相伴的「髮」的規範，譬如 40 歲左右的 12 位村社長老服完二年期的督導任務後，需將前額兩側的頭髮剪掉，以示區辨。參見 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 15. 對於髮的文化與象徵，需要進一步的民族學研究。

分墮胎次數能夠高達 15~16 次的原因。²⁷筆者認為，「強制性墮胎」概念本身，與其說傳達了婦女或部落社會的一般心理狀態，不如說是作者基於現代人道主義立場所進行的行為描述，一種後設的文化干預，即使僅僅針對生育或流產而言的客觀性。

第四，史料引用單薄化與研究方法侷限化：在引用史料方面，邵式柏過於倚賴少數西方文獻，特別是以 1628 年甘治士的民族誌為主軸，和 1623 年二位荷蘭公司商務員（Constant、Pessaert）的蕭壠城記為補充，容易陷入主觀式的奇風異俗描述和宗教立場偏見，若能擴大徵集其他中、西文史料，必能權衡不同觀點下的視野與看法。在原始史料方面，部分西文資料有些由於時間、語言或選擇性因素，並未被作者充分利用，譬如瑞士傭兵 E. Ripon 對福爾摩沙及麻豆人的觀察；²⁸D. Wright 於 1650 年代所寫，被 O. Dapper 編入《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及沿海活動紀錄》書中，有更詳盡記載福爾摩沙人的社會生活、宗教慶典，包括新港人的 27 條禁忌，鉅細靡遺且觀點有別於牧師甘治士的評論；²⁹或是 F. Valentijn《新舊東印度誌》第四卷提及福爾摩沙人的宗教信仰。³⁰漢文史料方面，明末 1603 年陳第〈東番記〉、1617 年張燮〈東番考〉、1620 年代後期周嬰〈東番記〉等三篇文獻，皆為能補充西方觀點的更早期記錄，應納入討論以相互印證。³¹

²⁷ 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19-20.

²⁸ 參見葉春榮編譯，《初探福爾摩沙：荷蘭筆記》（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11），頁 31-53；或艾利·利邦（Elie Ripon）著，《利邦上尉東印度航海歷險記：一位傭兵的日誌 1617-1627》（臺北：遠流出版社，2012），賴慧芸譯，頁 122-142。原文出自 E. Ripon, *Voyages et aventures aux Grandes Indes: Journal inedit d'un mercenaire, 1617-1627* (Paris: Les Editions de Paris, 1997)。文中提及麻豆社的婦女不會在男人去打仗的期間生孩子，此和新港社有相似的部落習俗，但並未交代是否實行墮胎，或如何避免生育孩子的預防措施，參見葉春榮編譯，《初探福爾摩沙：荷蘭筆記》，頁 34-35；或艾利·利邦（Elie Ripon）著，《利邦上尉東印度航海歷險記》，頁 124。這段珍貴的文字記錄，為邵式柏的假設與推論，提供有力論證。Ripon 的法文手稿最早出版於 1997 年，作者邵式柏在成書當時還未有機會目睹，因此不能說是未被利用，而是時間因素無法使用這批資料。

²⁹ 檢視這篇 Wright 的民族誌以及 27 條新港人禁忌，並未記錄任何相關墮胎習俗的敘述，墮胎行為是否有被牧師甘治士誇大，頗值得考慮！參見 J. Ogilby, ed., *Atlas Chinensis*, pp.17-37。這本書即 1670 年以荷蘭文編輯出版的 O. Dapper, ed., *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 (t' Amsterdam, 1670)。

³⁰ F. Valentijn, *Oud en Nieuw Oost-Indien*. (s' Gravenhage: H. C. Susan, 1724-1726), pp. 83-92.

³¹ 陳第，〈東番記〉，收入沈有容輯，《閩海贈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56 種，1959），頁 24-27；張燮，〈東番考·雞籠淡水〉，收入《諸蕃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李瑞源／人類學觀點下的西拉雅族群圖像：

再評邵式柏著《十七世紀西拉雅人的婚姻與強制性墮胎》

另外，在研究方法取向上，如何突破有限史料以發揮更強大效用，其實邵式柏若能結合考古學、語言學或地質學等相關研究成果，在瞭解史前曾經存續的部落社會生活基礎上，尋找 17 世紀西拉雅人歷時性的社會遺存與文化線索（歷史的連續性結構），探索土地與物質環境對社會人文的組織建構，相信愈能豐富對村社生活、社群互動的想像力，創造更具深度與特色的西拉雅人類學研究。這類型的研究取向，近十餘年來隨著大臺南大型考古遺址（南科、西寮、烏山頭）的開挖與研究報告而有顯著發展，譬如段洪坤連結臺南考古遺址與西拉雅文化的嘗試即為一例，其更以原住民意識出發，整理出西拉雅人獨特的「Babui」傳統文化意涵，媒合歷史文獻與當代社會，同樣具備異曲同工之妙。³²嚴格來說，用此論點來評論邵式柏的研究方法取向有其不周到之處，因為在 1995 年大臺南的考古工程正處於起步階段，與其說是邵式柏未能突破之處（單一化的研究取向），毋寧更在勉勵後學者能多加善用地下考古資料，以及其他跨領域的學術研究（語言、地質、民族學），突破文獻史料的侷限性與現有學術成果。

第五，偏向荷蘭觀點的改宗立論：作者在第七章的論點明顯採取荷蘭人說法，或者更正確地說是傳教士觀點，成就荷蘭人「成功」異教改宗的驚人數據與方程式，絲毫不懷疑資料的可信度。邵式柏引用不同時期的改宗數目，肯定荷蘭傳教士們的業績，並論說其成功模式是從一開始和新港人的聯軍作戰，透過優勢的軍備武力讓新港人獲致勝利，挽救其岌岌可危的區域政治地位與鞏固忠誠度，因此新港人改宗人數迅速提升。1635 年底打敗麻豆社之後，「新港模式」紛紛引起仿效，遂擴大複製至南北眾多村社，最後 1641 年在荷蘭政權充沛自信心下，徹底驅逐沿海五大社 250 位女祭司，其傲人成果是 1643 年牧師尤紐斯（Junius）宣稱有 5400 名受洗、1000 對配偶行使基督教婚禮。

頁 83-85；周嬰，〈東番記〉，《遠遊篇》（廈門：九州出版社，臺灣文獻匯刊，第 5 輯第 12 冊，2006），頁 162-167。

³² 段洪坤，〈臺南地區考古遺址與西拉雅文化的連結〉，《臺南文獻》，創刊號（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2），頁 81-91；段洪坤，〈為西拉雅的 babui 發聲——豬在西拉雅的傳統文化意涵〉，《南瀛文獻》，第 6 輯（臺南：臺南縣政府，2008），頁 72-81。

以上的說法與鋪陳，似乎完全順理成章，如流水線般順暢、水到渠成。然而不要忘記了，這些資料全來自統治者（公司政務員、宣教士）的眼光及言論，難以判讀其真實與虛構、平實與浮誇，更容易被牽著鼻子走；再加上作者有意引用有利的數據資料，支撐荷蘭政權統治或異教改宗光芒，不惜捨去或遮掩那些充滿矛盾的數據或激烈的宗教爭論，其實反映出另有歷史的黑暗面在醞釀，或者說是確實存在。舉例而言，查忻的研究指出，荷蘭人在宣教事業上的消極性格，缺乏有效規劃與策略施行，即使是最成功典範的西拉雅語區，在 1640 年代中期之後開始走下坡，發展停滯、消極守成。³³又或者，1646、1647 年連續兩年所舉行的北路地方會議（Landdag），公司向全體部落頭人宣講：由於太常聽到神職人員抱怨土著基督徒過於懶散，未盡到基督徒應盡的責任，因此那些聽懂新港語並且已接受基督信仰教導的村社，務必改善此情況，熱心參與教會和學校活動，也要讓孩子和少年們多去參加，以免遭受懲罰。³⁴雖然這告誡幾乎在後續的年度地方會議都會一如往例重複耳提面命，但這種半推半就、用斥責與懲罰來推動的基督教信仰，使人產生一種可能性聯想，究竟原住民是如何將基督儀式和自身傳統宗教結合，挪為己用？擁有選擇權的村社，當然就擁有主動上教會或學校的相對性選擇，即使外表展演基督儀式，內在卻是傳統思維。如果這樣的推論有其合理性，那麼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放逐沿海五大社的 250 名女祭司，究竟是由於充沛自信、過度自信還是缺乏自信？

另一方面，牧師尤紐斯所謂的 5400 人受洗，有否考量到改宗「認定標準」的嚴謹程度，是採取和歐洲白人一致的高標準，在神學教義上完全理解？或是只要能夠「背誦」基本教義、「回答」標準答案，不在乎原住民或許並未放棄自身信仰，均算是合格的異教改宗？「認定標準」的嚴格與否，實際影響真正的改宗人數，因此 5400 名皈依基督教的原住民，其信仰素質還是一項尚可議論的焦點。1640 年代

³³ 查忻，〈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頁 208-210。

³⁴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 II》，頁 501、608；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214, 328. 在 1647 年舉行的北路地方會議上，新港、大目降、麻豆、目加溜灣、大武壠等鄰近村社遲到，被公司當眾斥責說，這些距離最近、最早基督教化的基督徒，在服從性上卻是最散漫的一群，參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 II》，頁 607。

李瑞源／人類學觀點下的西拉雅族群圖像：

再評邵式柏著《十七世紀西拉雅人的婚姻與強制性墮胎》

中期，那些新來的牧師們，發現許多異教改宗的原住民並不真正理解神學教義，開始朝向提升基督信仰品質的目標而努力，希望能落實信徒們的心靈內涵；更啟人疑竇的是，1643 年尤紐斯牧師離開福爾摩沙之後，受洗人數寥寥無幾，西拉雅語區僅有 669 人。³⁵前後反差之大，顯示出在認定基督徒受洗資格上存在迥異標準；而尤紐斯牧師預留給接班人的三篇講章內容，均格外強調上帝與人之間的從屬性與唯一性，似乎間接為西拉雅人的薄弱信仰基礎提供佐證。³⁶1645 年 10 月，熱蘭遮城的大員評議會在信上抱怨，每年花這麼多錢（2 萬荷盾）在這些空有「基督徒」頭銜的人身上（特別指南路下淡水一帶），就像是只會複誦言語、擅長饒舌的人兒罷了。他們承認宣教事工有被誇大的傾向，並質疑以前牧師尤紐斯的做法有待商榷！³⁷1648 年 11 月，大員小會為了反駁尤紐斯牧師的不實指控，指證歷歷他幾乎在任何土著改宗上的事工都不符合基督精神，更不用說受洗標準了，他們直呼慶幸還好這些土著不是由他們所施洗的！³⁸

質疑改宗成效，如同宣揚改宗事蹟一樣並置於檔案文獻中，面對 1643 年西拉雅語區高達 5400 人受洗（甚至 5900 人）、³⁹1000 對配偶奉行基督教婚禮的堂皇數據，該如何解釋在短短 16 年之內（1627-1643）宣教事業突然迅速攀上巔峰？邵式柏的答案在此提供「獲取傳統成功途徑」的務實評斷；⁴⁰然而，或許另一個更接近本質核心的命題，應該朝向原住民實質心態與精神世界的研究，究竟西拉雅人是如何看待具備改宗資格的「受洗儀式」或「基督教婚禮」，二者在象徵符號與社會效

³⁵ 查忻，〈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頁 208、121。

³⁶ 同上，頁 55-56。對於改宗爭議，查忻在其論文第三章第二節有更深入探討，詳見查忻，〈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頁 51-62。

³⁷ Campbell,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210-213. 此處以南路下淡水為例或許不怎麼恰當，但其重要含意應該是，為了引起上層關切與爭取宣教事業在政治與經濟上的資源，傳教士是有可能會「浮誇」異教改宗績效的；另外，對於牧師尤紐斯在作法上的質疑，不僅暗示著南路一帶的傳教語言問題，更可能針對南、北路在受洗資格上的認定標準而言。

³⁸ Ibid., p. 241.

³⁹ 若加上大武壠社、諸羅山社約 500 人，則有 5900 人次受洗，成為一則「傳奇」被傳頌於歐洲基督教世界。參見查忻，〈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頁 207。

⁴⁰ Shepherd,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p. 63.

用之間如何達成一致與結合，是否伴隨精神與物質上的好處？易言之，多數西拉雅人選擇基督教文化，是抉擇或是彈性、是同化或是挪用，或許會是解開數字之謎的重要關鍵！

綜合上述幾點評論，希冀能提供讀者另類的視野與觀點，刺激更多的思考與論辯空間。簡單而言，邵式柏認為不能單由「墮胎行為」就順勢推導至人口壓力的必然性，必須切入更高層次的村社內在組織和外在威脅的整體面向分析，才能推敲出永續部落生命的文化制度設計。對於筆者來說，作者精彩展演一幅栩栩如生的西拉雅族群圖像，賦予其生命力而游刃於歷史文獻之海，她是活的，在邵式柏筆下依序輪番上演，躍然紙扉。建構族群圖像本是研究的基礎工作，逐步描繪出她的歷史面貌，才不會任由族群名詞像浮萍一樣漂流於斑駁書冊，徒留勾不著根的無垠與空洞，這也是筆者今後自我期許的實踐方向。

李瑞源／人類學觀點下的西拉雅族群圖像：
再評邵式柏著《十七世紀西拉雅人的婚姻與強制性墮胎》

參考書目

A. 古籍（依照筆劃順序）

周嬰，〈東番記〉，《遠遊篇》，《臺灣文獻匯刊》，第 5 輯，第 12 冊，廈門：九州出版社，2006，頁 162-167。

陳第，〈東番記〉，收入沈有容輯，《閩海贈言》，《臺灣文獻叢刊》第 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24-27。

B. 中文專著（含譯著）

艾利·利邦(Ripon, Elie)著、賴慧芸譯，《利邦上尉東印度航海歷險記：一位傭兵的日誌 1617-1627》，臺北：遠流出版社，2012。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 II》，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

李國銘，《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4。

葉春榮，《初探福爾摩沙：荷蘭筆記》，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11。

張耀錡，《臺灣平埔族社名研究》，臺北：南天出版社，2003。

C. 中文論文

李壬癸，〈臺南和高屏地區的平埔族語言：兼論麻豆社的地位〉，收入葉春榮主編，《建構西拉雅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臺南縣政府，2006，頁 17-38。

李壬癸，〈臺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臺灣風物》，第 42 卷，第 1 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1，頁 238-211。

查忻，〈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

文，2011。

段洪坤，〈為西拉雅的 babui 發聲——豬在西拉雅的傳統文化意涵〉，《南瀛文獻》，第 6 輯，臺南：臺南縣政府，2008，頁 72-81。

段洪坤，〈臺南地區考古遺址與西拉雅文化的連結〉，《臺南文獻》，創刊號，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2，頁 81-91。

張燮，〈東西洋考(摘錄)〉，收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諸蕃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 79-106。

張耀錡，〈平埔族社名對照表〉，《臺灣文獻專刊》，第 2 卷，第 1、2 期，另冊，頁 1-91，1951。

陳景峰，〈評介邵式柏著《十七世紀西拉雅族的婚姻與強制墮胎習俗》〉，《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8 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7，頁 249-264。

葉春榮，〈平埔族的人類學研究〉，收於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 91-141。

D. 外文專著

Dapper, O. ed., *Gedenkwaa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 t' Amsterdam, 1670.

Ogilby, J. ed., *Atlas Chinensis: Being a Second Part of a Relation of Remarkable Passages in Two Embassies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London, 1671.

Ripon, E. *Voyages et aventures aux Grandes Indes: Journal inedit d'un mercenaire, 1617-1627*. Paris: Les Editions de Paris, 1997.

Shepherd, John R.,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Arlington, VA: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

Shepherd, John R.,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李瑞源／人類學觀點下的西拉雅族群圖像：

再評邵式柏著《十七世紀西拉雅人的婚姻與強制性墮胎》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Valentijn, F., *Oud en Nieuw Oost-Indien*. s' Gravenhage: H. C. Susan, 1724-1726.

Campbell, William M.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Kegan and Paul, 1903(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Co.,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

E. 外文論文

Boomgaard, Peter, "Book Reviews: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KITLV journals*, Vol. 152, No. 3, 1996, pp. 483-484.

Masaharu, Kasahare, "Reviewed Work: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by John Robert Shepherd", *Asian Folklore Studies*, Vol. 55, No. 2, 1996, pp. 369-371.

Shepherd, John R. "Sinicized Siraya Worship of A-Li-Tsu,"，《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8 期：1-81，1986。

Shepherd, John R., "Siraya Marriage Practices in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Preliminary Explorations in the Household Registers,"，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大型研討會論文集」，2003 年 9 月 30 日-10 月 2 日，頁 239-286。

Shepherd, John R.,〈西拉雅族的阿立祖信仰〉，《臺灣風物》，第 37 卷，第 1 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7，頁 133-147。